



楚文化新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楚文化新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楚文化新探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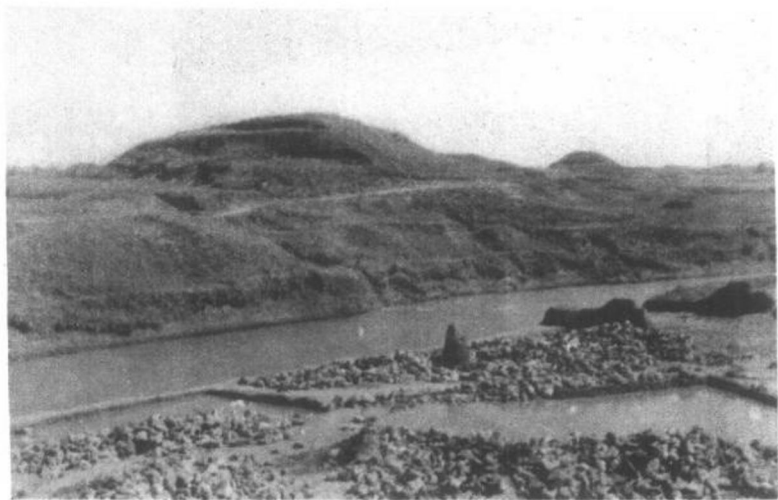
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875印张 3 插页 152,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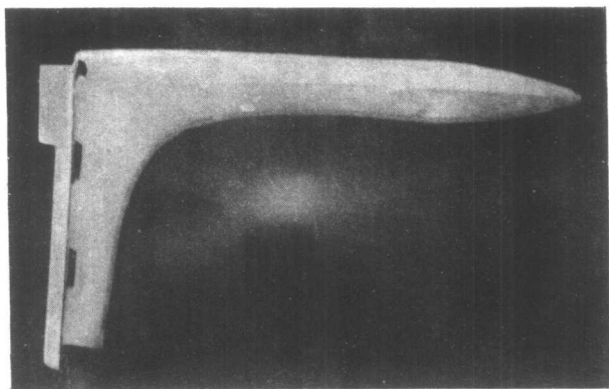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11106·133 定价：0.7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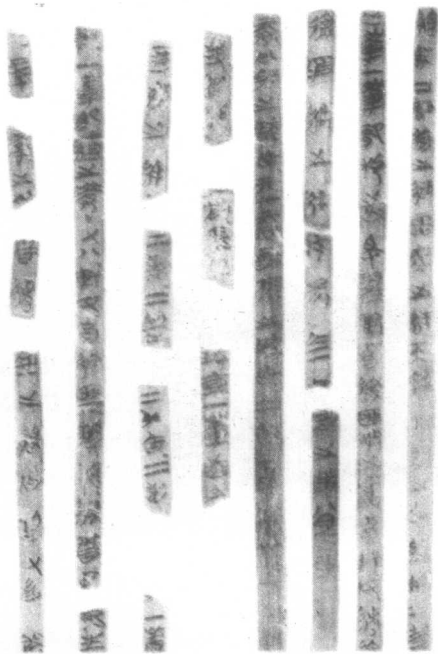
楚郢都故址(江陵)纪南城遗址。图为西城区，自西向东摄。水沟乃利用原城垣外城濠加深加宽而成。



楚国金币——郢爱，
江陵出土。



楚戈。上
有错金铭文：
“楚王孙鱼之
用戈”。江陵
楚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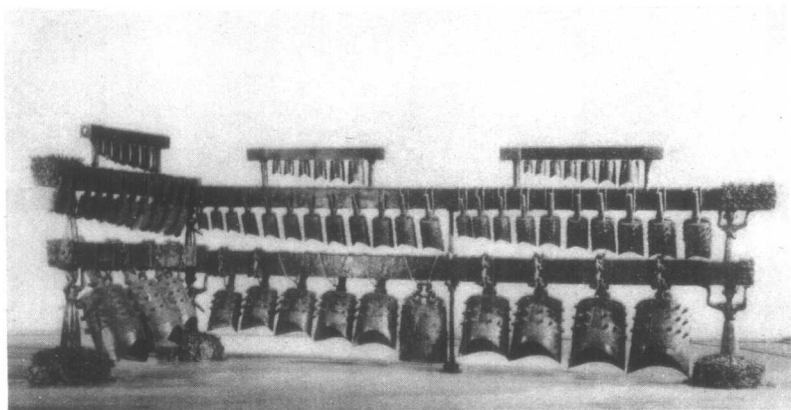
楚国
竹简。江
陵楚墓出
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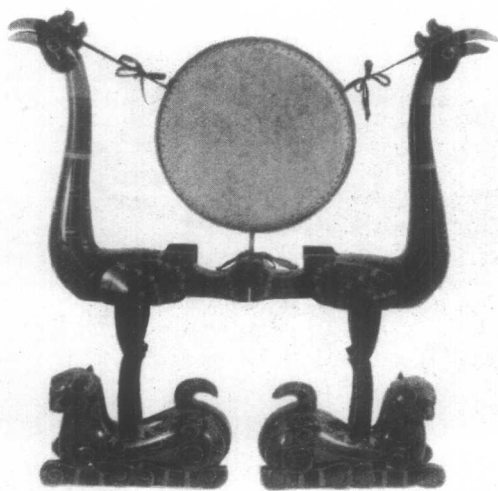
铁足铜鼎。宜昌出土。



错银铜尊。江陵楚墓出土。



编钟。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长架下层中部的一件编钟，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



虎座鸟架鼓。
江陵出土。

(以上图片，由湖北省博物馆供稿)

前 言

多年以来，学术界认为中国文化起源只限于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但是，日益增多的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表明：这种中原中心的传统观点，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辽阔的我国土地上，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只是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还有其他中国文化发源地，它们都是中国远古文化的组成部分。以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为中心的楚文化，在很早以前，就与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互相辉映，使中国远古文化鲜花繁集，灿烂夺目，光照世界。

正如夏文化研究一样，对楚文化的探索也日益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兴趣。一些学者在开拓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中需要交流心得体会。本百家争鸣方针，我们组织了几篇楚文化研究的文章，编成这本小册子，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进行楚文化研究，共同开拓这一新的学术领域。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80年6月1日

23-1/60

目 录

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	俞伟超 (1)
新出简帛与楚文化·····	李学勤 (28)
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	苏仲湘 (40)
随国、曾侯的秘奥·····	顾铁符 (68)
先秦至汉初“云梦”地望探源	
——古云梦泽故址新探之一·····	石 泉 (91)
楚郢都建制考 ·····	刘彬徽 (102)
古代楚国的两大水利工程期思陂与芍陂考略	
·····	何 浩 (118)
简论楚国语言 ·····	刘先枚 (134)
战国楚文字小记 ·····	陈邦怀 (149)
江陵拍马山楚墓鸟篆戈铭新释 ·····	黄盛璋 (156)
论楚文学的产生、发展与影响 ·····	张啸虎 (160)
论楚刑法 ·····	吴永章 (180)
楚国强盛剖析 ·····	李 建 (191)
从湖北发现的秦墓谈秦楚关系 ·····	陈振裕 (200)

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

俞 伟 超

一、为什么要重视楚文化的研究

最近几年来，考古与历史学界对楚文化的研究是相当重视的。例如，1977年在河南登封告城镇举行的夏文化讨论会上，有的同志就提出应召开讨论南方楚文化的学术会议。接着考古学界又在南京召开的讨论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问题的会议上和1978年庐山召开的讨论江南地区印纹陶文化问题的座谈会上，都发出了召开讨论楚文化会议的呼声。1979年三月底至四月初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上，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又提出成立楚文化研究会的建议。同时期，在四月上旬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和全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也提出成立楚文化研究会的要求。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四省的同志召开了两次联席会议，准备成立楚文化研究会。正是在这基础上，中国考古学会决定1980年第二次年会在湖北举行，重点讨论楚文化问题。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前后共五次次会议，都提出了召开楚文化讨论会的要求，反映了大家对楚文化研究的重视。为什么对它这么感兴趣呢？仅仅是这几年楚文化的遗址遗物发现得较多，新材料很丰富吗？还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呢？据我的理解，恐怕重要的还是跟我们应当在理论上全面地阐明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大任务有关。简单地说，不把南方

的问题搞清楚，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的理解就会是片面的或者是比较片面的。

大家知道，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所谓四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就是因为人类历史在四个国家最早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最早从原始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最早产生国家，最早出现文字。用通俗的话说，是最早从野蛮时代跨入到文明时代，最早发展起自成体系的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为什么这四个国家发展得最早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至少有一条是与当时这些国家的自然条件有关。大家知道，当人类还处在幼年时期，要发展起高度的文明，自然同农业的发展有关。人类从狩猎时代或者渔猎时代进入到农业时代，就可以定居，更好地积累生产和其它各方面的知识，而在四、五千年前的条件下，一些河谷地带对发展农业是极有利的。古代的西亚，正是地处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发展农业有利，所以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埃及也是因在尼罗河流域，发展起来了最早的农业。古代的印度就是因为处在印度河上游和恒河流域，也发展了最早的农业。中国呢？也有同样的有利条件。传统的讲法是说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这个讲法对不对呢？应当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在发展自己的文明时，如前所述，与农业的起源有关。在全世界范围内，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古代农业发达最早，它约在五千多年前进入到了阶级社会。再往上推的话，据这些年的考古发现，在伊拉克的耶莫等遗址里，早在九千年以前已开始从狩猎时代进入到了农业时代。所以，那里的最早文明是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基础和经济基础的。

中国呢？根据这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至少在七千年以前已

经进入农业时代了。这些年来，在探索新石器早期文化方面找到了一些线索。实际上在二十年以前，在渭河流域就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老官台文化。最近几年来，又在河北邯郸附近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文化，接着在河南又发现文化性质和时代都相当于磁山文化的裴李岗等遗址。可见，在那一带，最迟在七千年以前已经进入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农业和定居，而这些并不是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就是说发生农业和定居的时间还应早些。这样说来，黄河流域最早发生农业和定居的时代，和西亚、北非等世界上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就相差无几了。到了四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夏王朝，进入到人类的文明时代。显然，我国所以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样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的。

黄河流域是我国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发祥地，而夏、商、周三代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生和发展时期。这三代的文明，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所以，把黄河流域说成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这话并不错。

但仅仅强调这一点并不全面。因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黄河上、下游同中游地区的文化就是各有自身传统的，而且几乎与黄河流域同时，长江中下游也发展起了农业文化，它同黄河流域一南一北，同时在迅速地发展着人类的原始文化。

大家知道，前几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已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前发展到了相当高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个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不断的发展。至于长江中游地区，根据目前的发现，已经找到了相当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几个阶段的原始社会文化，这就是从河南南部经湖北至洞庭湖北部和三峡地区发现的很发达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以及一种发展阶段类

似于龙山文化的东西（有的同志就把它暂时命名为“湖北龙山文化”或“青龙泉三期文化”）。

与此同时，五岭内外及珠江流域也发展着另一种独特的原始文化，可以说，黄河、长江、珠江这三大流域在几千年以前都发展起了有自身特点的原始农业文化。这些文化，分别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是它们同另一些文化共同组成了我国的文明。黄河中下游的原始文化，发展到四千年前以后，进入到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至少在周代，长江、珠江流域也进入到阶级社会，其中在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楚文化，最后在政治上几乎统治了整个南中国。楚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一个结晶。在楚文化的母胎中，最后孕育了屈原这颗中国古代文化的明珠。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但对长江以南的古代文明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要比较准确、全面地理解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自然应深入探讨楚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二、楚文化发展的简单旅程

楚文化应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某一支所发展起来的。当这支文化发展成一个独特的文化共同体之后，它又不断地和周围其他文化相互作用。就楚文化自身来说，必然有一个范围，而这个范围是会发生变迁的，这是考古学上研究楚文化所要探索的问题。为了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可以先从文献记载方面来归纳一下楚文化活动范围的旅程。

《诗经·商颂》是春秋时宋国人在宗庙祭祀中的一些史诗。

宋人是商人的后裔，其中有一篇在追颂其祖先商王武丁时，说到武丁曾“奋伐荆楚”（《殷武》）。武丁是商王中强盛的一代，所以曾南征荆楚。由此可见，在商代后期，长江流域的楚人已经是商王朝所力图征服的一支力量了。

1977年初，在周人的老家——周原遗址（今陕西岐山县京当公社贺家大队凤雏村南）的一个西周早期的甲组建筑基址中，有一个打破基址的灰坑（H₁₁），里面出土了一批商末至周初的周人甲骨文，其中有一条刻有“楚子来告”等字。由此可见，在周初之时，周天子确实是把楚国封为子爵的。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在商代末年，楚人的首领鬻熊曾“事文王”。周成王时，分封诸侯，就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子男之爵，居丹阳。可以认为，最迟在熊绎时，楚人已正式建立了国家，都城建于丹阳。

丹阳在什么地方呢？搞清楚这个地望，对于探索楚文化的起源，自然有极大的意义。

一千多年以来，关于丹阳的地望，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史记·集解》引徐广说“在南郡枝江”；唐代张守节《正义》引《左传传例》也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这是有关丹阳故地所在位置的最早出现的一种说法。

二种是：在今秭归县一带，主要是酈道元《水经注》提出来的。唐初的《括地志》也主巴东境内之说。后杜佑《通典》又提出先在秭归、后在枝江的折衷说。

三种是：在今河南南部的丹淅之会，即今丹江水库一带。《史记·楚世家》记，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年）秦楚曾战于丹阳。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讲丹阳在汉中。元胡三省在《通鉴注》中讲“此丹阳即丹水之阳也”。班固《汉书·地理志》说，丹水

“水出上洛冢领山，东至析入钩”。地在武关之外，秦楚交战当在此。自清宋翔凤以来，许多学者主此说。

究竟哪一说正确呢？

“秭归说”不可从。因为在西陵峡内，山高平地少，不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从楚国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来说，也很难设想最初会在三峡之中建都。此说之所以发生，可能同丹山这个地名有关。从《山海经》开始，就记载今巴东至秭归一带，有山名丹山。丹阳之名，按照古代对地名命名的习惯，往往是指丹水之阳（水北）或者是丹山之阳（山南）。巴东至秭归一带古代既有丹山，丹山之阳就可能是在长江北岸。所以，《水经注》便讲在长江北岸有一个“据山跨阜，周回八里二百八十步”的古城，即熊绎所都。后来又相传今秭归县城对岸偏上游处，在临江的山岭上有一楚王城。1979年5月，我们调查了这个古城，发现与《水经注》记载的位置不合。古城城垣分三次筑成，上层是明代的，中、下层时代不明。下层夯土内有相当于龙山阶段的遗物。地面上的陶片，有很多明代的“龙泉窑”瓷片，还有汉代瓦片甚多，没有见到西周遗物和唐宋遗物。如果中层是汉代的，则此城始建于战国以前。当然，要准确地判断此城的年代，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况且，此城即使是始建于西周，当时这一带也还存在一个夔国，不能确定它就是熊绎所居丹阳。从整个地理环境及楚国发展的历史过程考虑，熊绎所居丹阳，不大可能是在这里，楚人在这里修筑东周城则是可能的。

那么，“丹淅之会”和“枝江一带”的说法，那一种可信呢？

过去，我是比较倾向于“丹淅之会”说的。通过这次调查和沿途所见到的一些资料，感到还是“枝江”之说的可能性最大。

春秋晚期的楚灵王时，右尹子革曾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蓀露蓝蒨，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昭公十二年》）熊绎之时，既是建都于丹阳，又“辟在荆山”，可见丹阳距荆山应不会太远，甚至可以认为丹阳就是在荆山脚下。按照古代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考虑，一种文化总是沿着河流发展的。荆山的中心地带，在今南漳、保康一带，沮河、漳河自这一带发源，南下注入长江，到了今当阳县东一带，就是荆山脚下的平原地带了。沮河、漳河在这一带再往下不远，至今河溶公社所在地，就合二为一。熊绎的“辟在荆山”不会在南漳、保康一带山岭的高峰处，很有可能就在荆山脚下的平原地带，即今当阳县至枝江一带，这样，丹阳就有可能在此附近。

当然，荆山之地，在其北麓的神农架一带还发源一条南河，东北注入汉水。那么，熊绎在南河下游，在荆山北麓的山脚下开辟土地是否可能呢？

不过，再分析一下西周中期以后楚国疆域扩大的过程，就可知道“枝江”说最有可能成立。

根据很多西周铜器铭文和历史记载，到了西周昭王时，楚国的力量已经比较强大了。那时周昭王曾亲自率师南征荆楚，但“南征而不返”（《左传·僖公四年》），打到江汉流域就丧身而亡。当然，这并不能说那时楚国的力量已经比周人强大了，因为周昭王是远离本土征伐，后方供应困难，又有水土不适宜等多种原因，所以很容易打败仗。但这至少说明楚国力量已比过去强大。不过，据《左传·僖公四年》所载齐桓公与楚使对话，楚境当时未到汉水。

史称到了周夷王时，王室微弱，楚国此时已往外发展。当

时，楚子熊渠已“甚得江汉间民和”（《史记·楚世家》），就向西北征伐庸国（今竹山县一带），又向东发展到了鄂（今鄂城一带）。那时，西边的庸国没有完全被灭，但削弱了其力量，楚人已使自己的力量发展到了那一带，而东边的鄂则是牢牢地被楚人控制了。可见，到了西周晚期，楚人主要是沿着长江向东发展的，在今湖北地区的沿江两岸已成为楚国疆域。

早在1962年时，在江陵的万城曾出土一批西周中期偏早的铜器，据铭文，皆为邲子之器，可知当时那一带存在一个“邲国”。楚国的控制范围，在西周早期至中期，大概主要还是局限于沮漳河一带，甚至是沮漳河西岸一带，其间也还插花式地存在着一些其它诸侯小国。但是，到夷王以后，沿江两岸，就皆为楚国的疆域了。

到了平王东迁以后，春秋时期，楚国势力就进一步向北发展，首先是尽力向汉水流域发展。当时，在汉水及涑水流域，大洪山两侧及其以北的地区，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诸侯国，其中以一些姬姓诸侯为强，即“汉阳诸姬”。楚国要往这一带发展，就得先征伐它们。当时对一个与楚国接壤而力量最强的姬姓国——随国，春秋初年的楚武王就连续征伐它三次。这时约在前740年，楚子已自称为王了。

关于随国，大家知道，其中心当在今随县一带。这个随国，《左传》记事很多。这些年来，在随国范围（京山——随县一带）内发现的西周末年至春秋，甚至战国的铜器，多为曾国器，而不见随器，因此，很多同志推测文献上的“随”就是铜器中的“曾”。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据1978年随县发现的曾侯乙墓中所出的一件与宋代所出相同的铜罍，可知楚国虽然三次征伐随国，但并没有完全把它灭掉，直到前433年时，即楚惠王五十